

# 信息社会的隐私权利主张与司法回应 ——基于隐私侵权案由裁判文书的内容分析

李婷婷 张明羽

## 摘要

本文旨在研究信息社会的隐私权司法实践问题。通过北大法宝上隐私侵权为案由的民事案件判决书展开全数据库搜集,本文得到可分析的案例共计858例。本文认为,裁判文书体现了原告、被告和法院三方对话,原被告双方对话呈现出人们的权利主张,而法院的裁判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隐私权保护态度。通过编码和内容分析,本文发现,信息社会人们的隐私认识与时俱进,隐私焦虑无处不在,但人们通过侵权责任法主张隐私权的能力受到诸多限制:人们害怕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监视监听,但对信息社会中其他个人信息交换行为、痕迹信息的获取行为和无所不在但隐形不可见的监视却缺乏举证能力,针对熟人实施的“看得见的伤害”是人们通过民事案件所仅能主张隐私权;而法院在隐私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中表现出平衡各种法益的保守态势,总体上依然以传统的隐私侵权认识为基础,保护显然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隐私权。由此本文提出,信息社会隐私权的保护仅依靠民法和侵权责任法已经过于单薄无力。

## 关键词

权利主张、司法态度、裁判文书、内容分析

## 作者简介

李婷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电子邮箱:tiara\_lee@yeah.net。

张明羽,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学院讲师,电子邮箱:zhangmingyu59@gmail.com。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法律引入“被遗忘权”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编号16CXW023)的研究成果。

## Right Claims and Judicial Attitudes of Privacy in Information Society——A Content Analysis of Privacy Infringement Judgments

LI Tingting ZHANG Mingyu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privacy practic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rough a large-scale collection of civil case judgments of privacy infringement on PKUlaw, a total of 858 cases were obtained, and the contents analysis of these judgments were did. We assume the judgment is a three-way dialogue between the plaintiff, the defendant and the court. The dialogues between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show people's rights claims, and the court's judgment reflects their privacy protection attitude. The study found that people's privacy awareness is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privacy anxiety also grows, but people's ability to claim privacy through tort law is limited: they are afraid of the ubiquitous camera surveillance, but they lack evidence to sue or win when ot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exchange behaviors, the acquisition of trace information and the ubiquitous but invisible surveillance happen. The “visible harm” implemented by acquaintances is that people can only claim privacy through civil cases. The court's trial of privacy infringement civil cases shows a conservative trend of balancing various legal interests. In general, it still relies on the traditional privacy infringement awarenes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rights that have obviously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vacy righ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 too weak if only based on the civil law and tort liability law.

## Keywords

Right claim, Judicial attitudes, Judgements, Content analysis

## Authors

Li Tingti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tiara\_lee@yeah.net

Zhang Mingyu is a lecturer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mail: zhangmingyu59@gmail.com.

This paper is a resul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Youth Project “Study on the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to Chinese law” (No. 16CXW023).

## 一、信息社会隐私问题的提出

隐私权在十九世纪末被Samuel D. Warren和Louis D. Brandeis (1890) 撰文提出应当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存在, 他们将其界定为一种不被打扰的独处权, 主要内核为一种精神性自由及享受生活的权利, 这一权利提出的主要时代背景是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和拍照技术的无孔不入带来对私生活的打扰。在张明安 (2012: 117) 的追溯中, 这不是隐私权的首次亮相, 他提出至少在1858年就有法国法官在侵权责任法的语境下提及了私人生活应当受到保护, 而英国人也早早讨论了基于特殊关

系（如医生等）产生的保密义务。可见，隐私并非绝对的不为人所知或私生活的绝对封闭，而被后来人总结为一种限制知悉和限制接触的状态（Madison Powers, 1996）。

隐藏和保密的需求与市场经济知情需求及人们的窥私欲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如何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根植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自主把控和限制知悉成为受到认可的选择，Alan F. Westin（1968）提出隐私的自主把控意味着个人可以主张自己在何时、通过什么方式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分享给别人、分享到什么程度。Charles Fried（1968）甚至将隐私权视为一种社会秩序，凭此，个人可以控制他人对自己信息的接近。限制接触或个人对自己信息的控制强调个人作为隐私权主体，应当享有对个人隐私的配置能力，尽管身为法官的Posner（1978）从社会成本的视角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与社会交往中获得足够信息以降低成本现实不符，尤其特定关系如雇员、配偶、朋友等情形或商事应当披露信息的情况下，刻意隐藏意味着欺诈。但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大发展，个人信息的处置权似乎依然是建基于自主控制上，典型代表是个人信息保护前沿立法GDPR亦主要站在个人信息的自主掌控和自决权的基础上强调人们可以要求自己被遗忘（或称删除权），也可要求自己的信息以格式化的方式披露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上——所谓信息可携权。

在Posner（1981）的预言中，正如隐私权的诞生是因为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活空间的增大，物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更大的藏匿可能性。但信息社会对痕迹的记录和大数据云储存能力，却在让藏匿的可能性往预言中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技术充分激活了个人，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联在网络空间中更加简单便捷，社会变得最大限度的开放（喻国明，2015），从信息社会走向透明社会发生在一夕之间，从个人到企业到政府，日常公开、开放数据等，通过技术和研究的推动几乎每天都有新变化；一方面是平台和权力部门的管理和监视能力大大提高。今天讨论个人信息已经不再只关心其对普通个人的价值，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与海量上网的信息，牵涉社会治理成本、国家安全、公共价值，还有无处不在的商业利益（王利明，2012），个人权利、信息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平衡成为新议题；此外信息技术让互联网具备了“矢志不忘”的特性，任何信息在上网之后就永远存在，随传播载体的消失而让个人隐私随风飘散的个人隐私保障思路成为神话。

在此环境下，隐私侵权民事诉讼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让个人享有隐私权，在隐私权的义务主体扩展到更多个人和企业的时候，司法实践是否能成功给个人赋权，

成为信息社会隐私权实践的新课题，而这也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我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及民法总则虽然明确隐私权需要保护，但均未列明隐私权的范围和边界，本文将结合民法学者对隐私权概念内核的界定以及早已开展的司法实践予以归类和界分，提炼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人们的隐私权利主张及司法回应。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设计

本文对北大法宝这一当前国内比较全面的专业司法案例数据库开展了检索，以人格权项下的隐私侵权案由为检索条件，不限起始时间，以研究数据搜集截止期的2019年7月31日为时间节点，全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搜集隐私权纠纷案例，出现1545条检索结果，通过全文全部下载，剔除乱码、空文档、刑事案件、执行案件、重复案件、程序性文书等，还剩858个隐私权纠纷案件样本，其中一审案件339个、二审案件196个、审判监督案件44个、撤诉案件201个、不宜公开64个、调解结案14个。这些样本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编码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原被告双方交锋中呈现了我国普通公众怎样的隐私认识和主张？其二，法院在对诉争双方的裁判当中，呈现了当前司法实践对隐私权怎样的保护态度？

在全部样本中，一审和二审文本最为完整，包含了原被告及法院三方的对话，能够直观的回答本文希望解答的上述两个问题，成文本文编码的重点。本文以此三方立场和态度为节点划分依据，通过两位媒体法研究者反复通览全部判决书，结合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及隐私侵权相关规定，经初步编码和反复提炼，最终确定如下编码：

### （一）原告

原告是诉争案件发起人，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我国民事案件的审理以原告诉讼请求为依据。在此意义上，原告是案件的中心，其提出诉讼请求，并提供支持自己诉讼请求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本文对原告相关内容重点编码了两个节点，分别是诉讼请求和侵权事实，并在各节点下分子节点若干：

节点一，侵权事实。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对隐私侵权行为的规范性罗列，但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已经被国内外研究者讨论颇多，当前的隐私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私生活不被打扰和私事不被公开，而当下，信息隐私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关切。据此，本文将侵权事实编码为上述三个子节点。1.私生活被入侵，这一项下继续划分二级子节点如下：（1）监视偷拍，监听、监视及跟踪偷拍编码在此节点；（2）骚扰，本文将骚扰电话、垃圾邮件和人肉搜索编码在此节点；（3）侵害通信



自由,本文编码内容包括偷看信件信息、获取通话记录等;(4)侵入私人空间,本文将闯入私人住宅或私人办公空间编码在此节点。2.私事被公开,本文将此项编码子节点如下:(1)公开身体隐私,即身体或肖像被拍摄和公开;(2)公开特殊信息,这往往是基于特殊权利义务关系形成的某些特殊隐私信息,包括看病就诊信息、酒店入住和开房信息、升学就业信息、犯罪诉讼信息、个人财务信息、家庭相关隐私信息、婚恋特殊信息等。3.侵害信息隐私,与上述私事和私生活不同,信息隐私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出现的新的隐私关切,本文将编码为三个二级子节点,(1)传播或窃取身份信息,主要是可识别的个人身份信息被盗用或传播;(2)获取定位或痕迹,即人们的行踪定位或浏览痕迹等被手机或其他设备后台所获取公开。

节点二,诉讼请求。诉讼请求在格式化的审判文书中通常在开头列明,本文将之编码为四个子节点:1.赔偿损失;2.赔礼道歉;3.停止侵权;4.其他。

## (二)被告

被告也是诉争案件中的权利义务方,是案件的起因,在诉讼中主要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答辩。本文对被告编码以下两个节点:被告身份;反驳理由。前者试图厘清原告对何种关系下的隐私侵权更敏感;后者以被告的回应剖析当前人们对隐私侵权在法律应用上的理解,这两大节点各自细分如下:

节点一,被告身份。信息社会的传播和记录主体多样化,本文在此只区分个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个人和单位在侵权能力上差别巨大,原告的权利主张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权利主张能力。同一个案件可能出现多个被告,因此本文将被告身份编码为三个子节点:(1)单位,(2)个人,(3)单位+个人。

节点二,反驳理由。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规定,侵权行为认定往往从程序和实体分别分析认定。这也成为本文针对被告反驳理由的编码依据,本文在反驳理由下对此编码1.程序性反驳,此节点下编码(1)诉讼问题,当被告提出原告存在一事多诉、反复诉讼或其他诉讼不合法律规定的情形编码在此节点下;(2)主体不适格,被告提出自己不是适格的被诉主体;(3)超出诉讼时效,在我国不同的诉讼案件存在不同的时效规定,被告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编码在此;(4)无法律依据,当被告提出原告主张的隐私侵权行为无法律依据,编码在此节点;(5)举证不足,被告主张原告提出的证据无法证明主张事实。2.实体性反驳,此项包含五个次级子节点:(1)行为,这一节点编码被告就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是否存在或多大程度上存在开展反驳,在此节点下细分非隐私、未公开和无侵权事实三个次级子

节点,分别对应被告提出原告主张内容并非隐私、被告提出自己并未将原告的信息公开、及被告主张自己的行为根本没做过原告主张的隐私侵权行为;(2)过错,在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被告根据自己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开展反驳,在此节点下编码非故意和无过错两项;(3)违法性,即便存在侵权行为,法院还需考虑是否存在法律抑制性因素阻却侵权行为的违法性,此项下本文编码法益冲突、避风港、原告过错和原告同意四个次级子节点;(4)损害,当被告行为存在,依据其给原告造成的损害情况不同也存在法律惩处程度上的不同,本文将此节点编码积极止损、自助行为、未造成损害、和已受处罚四个次级子节点;(5)因果关系,即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编码在此节点。此外,此项下还有3.无反驳和4.承认诉求。

### (三) 法院

法院是隐私侵权纠纷案件的中立方和裁判方,裁判文书的撰写和发布方,法院裁判体现了当前司法机关对隐私权的保护导向。本文旨在通过编码审视司法实践对隐私权诉求的回应,依据裁判结果本文划分五个节点:原告胜诉、原告败诉、驳回起诉、不予受理和调解结案。其中主要对原告胜诉和原告败诉部分继续编码:

节点一,原告胜诉。只要案件中原告的任何一项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文就编码为原告胜诉。依据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不同,本文编码三个子节点:(1)赔礼道歉;(2)停止侵权;(3)赔偿损失。

节点二,原告败诉。当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时,本文编码为原告败诉。依据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本文同样分程序和实体两个子节点,依据已在被告部分陈述,此处仅在此列明。在程序下编码(1)诉讼问题、(2)主体不适格、(3)原告证据不足和(4)超出诉讼时效四个次级子节点。在实体下,编码(1)行为,包含非隐私、未公开、无侵权事实和自助行为;(2)过错,包括非故意和无过错;(3)违法性,包含法益冲突、避风港、原告过错、原告同意;(4)损害,包含积极止损和未造成损害;(5)因果关系,即行为与损害无因果关系。

对于二审案件,为避免重复编码,本文主要编码上诉人和法院审判结果,上诉人下编码1.身份和2.原审身份两个节点。法院审判则根据实际情况编码1.驳回上诉,2.改判原告胜诉和3.改判被告胜诉。此外,对于撤诉案件,还编码了1.撤回上诉,2.撤回起诉,3.撤回再审三个子节点。对于撤诉案件中的原被告身份,本文也依据个人和单位的不同分别编码确认。而对于原被告的身份在经过二次编码,将单位被告人类别和个人被告人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分别在此编码,并在文内呈现其特征。

### 三、资料分析与研究发现

本文编码由两位媒体法研究者通过Nivivo12.0共同完成。经整理,本文共涉及146个码号、4788个参考点,其中,本文编码时将同一个案件反复出现相同情形编码到一个参考点中,也即一个参考点对应了一个相应案件。针对原被告的编码旨在探寻人们在案件中呈现的对隐私权的认识及主张,对于法院的编码则试图呈现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隐私权保护回应,据此,本文也从这两方面剖析研究发现:

#### (一) 实践中的隐私认识及隐私权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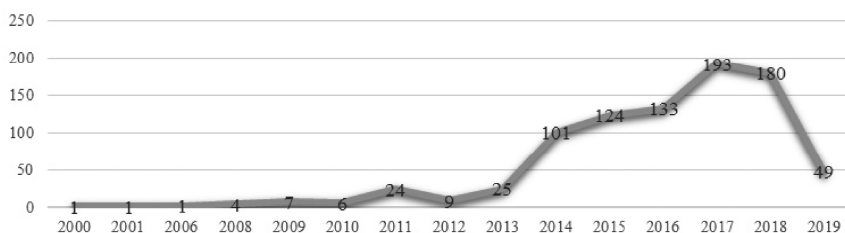


图1 样本时间分布图

上图可知,样本中第一起隐私侵权案件发生在2000年,此后2001、2006年零星出现,这些案件分别是肖镇诉陕西《收藏》杂志社侵害隐私权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0),陶岚诉上海黄金海岸金玉兰俱乐部有限公司案(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2000)和杨某某与沈阳日报社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纠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2008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让“隐私权纠纷”成为独立的三级案由,以此为节点,隐私侵权案件数量呈现逐年增加态势。<sup>1</sup>

1.从编码的侵权事实看,样本案件中隐私侵权事实丰富多彩,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藏匿或隐藏的多重需求和对隐私权多层次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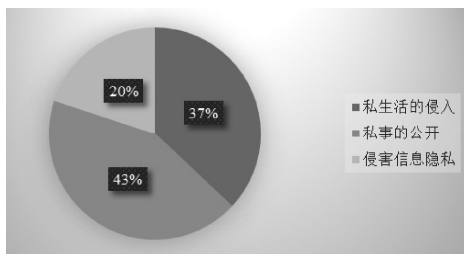


图2 侵权事实

从编码结果看,列表中的各种隐私侵权事由都出现在了诉讼案件中,其中私事的公开和私生活的入侵占比较高。前者以公开特殊信息事由包含最多参考点(118

个), 财务征信信息、医疗就诊信息、教育信息、婚姻家庭信息等不仅与个人私生活密切关联, 在诸多情况下还牵涉其他相关权益如雇员权利、家庭和谐甚至财产安全等。而在私生活的侵入中, 监视偷拍成为人们对私生活空间打扰最为担心的事由(含86个参考点), 侵害通讯自由、侵入私人空间及骚扰也10次以上出现在诉讼案件中。与此同时, 人们日益关注可识别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 此类诉讼案件占据两成之多。

2. 信息社会的监视监控现象备受关注, 大量与摄像头安装相关的纠纷走上法庭, 本文编码中监视偷拍出现频次达86例之多。

摄像头的安装价格低廉, 也伴随人们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频频出现。邻里关系下的隐私权纠纷几乎无一例外聚焦在摄像头安装上, 邻里纠纷在本文二次编码中含45例之多, 典型的表述如“原告发现被告在自家房屋上私自安装了摄像头, 原告所居住的房屋及内部均在摄像头的监控范围内。”(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出现在出租屋、酒店等相对私密的场所, 公共场所如服装店等地也有零星相关案例, 潜在的窥视让原告感到担忧, 提起诉讼: “二被告在该房屋内安装了七个摄像头……用手机可以远程实时偷看包括原告在内三个女租客的举动, 导致我们的隐私无所遁形。”(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2016) “我在被告经营的衣迪缘服装店购买夏装, 在试穿第三件衣服时发现试衣间上方装有摄像头。”(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 2014) 此外, 日常生活中的监控也被运用、被关注, 亲密关系破裂时的取证为重要场景, 如: “马某在原告个人驾驶的宝马轿车中放入监听监控和偷录设备, 有证据直接表明监控监听偷录时间就长达一年以上。”(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2018)

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摄像头大国, 除了国家权力机关安装的监控探头保障公共场所安全外, 摄像头和监视监控设备也被普通人广泛使用, 以保护财产安全或自己的“领地”。然而这些频频出现在邻里关系、夫妻关系和服务关系纠纷中的摄像头引发被监视和被窥测的担忧。

3. 特殊信息被公开也爆发了较多隐私侵权诉讼, 且此类案件的单位被告数量远高于个人被告, 特殊服务关系下, 个人与服务单位之间因特殊信息公开问题张力十足。

本文编码的特殊信息包括个人征信及经济状况、疾病医疗信息、诉讼纠纷或涉案信息、家庭特殊状况信息、开房信息、学业信息等。这些信息通过亲密关系或特殊服务关系获得。其中, 医疗和疾病信息及银行信息被披露的案件大量出现, 泄露

的结果还往往伴随着其他权益保障问题。如“被告……将我的住院志发给我的工作单位……因住院志中含有对我酗酒的诊断，导致我的此项隐私被公司知晓，公司……故于2013年4月与我解除了劳动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

“被告确与关系单位联谋，泄露原告医疗重要信息，使其发出不利原告的所谓医疗保险告知书一份，胁迫原告撤诉并调解。”（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除了身体健康情况等泄露对雇佣关系下的雇员保障产生负面影响外，征信信息和个人财务状况也经常让银行成为隐私侵权被告，如“被告未经原告书面同意，也未事先告知原告，擅自将原告信用卡逾期的记录等不良信息违法提供给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另一起与银行相关的隐私权诉讼中，原告称“与卓某X无业务往来的武平县信用联社未经其本人授权……私自查询卓某X的个人征信。由于卓某X的个人征信查询次数过多……已造成公司无法正常运行……家庭夫妻反目。”（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16）

另外，随着几乎全部信息皆可“上网”，服务商搜集的个人信息可能因系统安全漏洞带来信息泄露风险，但这一风险的泄露人可能反而无法查实。

互联网上爆出……包含2000万条酒店客户开房记录的数据包以及以该数据包为基础的开房信息查询网站。原告下载了上述数据包……发现自己在汉庭酒店的包括上述信息在内的入住信息也在其中。随后，原告又通过搜索“找开房网”……亦显示有包括原告姓名、身份证号、性别、生日、住址、手机号码以及开房时间等的个人隐私信息，且与上述数据包中的信息一致……原告的隐私权业已受到严重侵害，原告也因此遭受不明来历的推销广告、短信等骚扰，并严重影响了生活品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

在商业发达的信息社会，验证个人信息是获得服务的前提，而伴随这些特殊服务，也生成了个人的特殊信息。为了保障这些提供服务的商业主体正常工作，法院有必要保障其合理使用这些信息，不会也不可能无条件的拓宽隐私权保护的边界。如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在体检表上的正常列明，与其就业单位评估用人成本直接关联，也牵涉夫妻双方的知情权，银行的征信信息则是发放贷款的依据，彼此间的征信信息共享也是降低贷款风险的合理路径，酒店的开房入住凭证是保障服务安全的前提……其泄露主体的确认及隐私侵权是否成立，尚需法院综合考虑和认定。

4. 尽管个人信息的隐私权属性尚存在争议，但实践中原告已将其视为个人隐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诉讼争议中的个人信息被泄露，部分造成了原告的后续损



失，而部分仅出现了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情况。

从总量上看，侵害信息隐私案件占比不高，时间分布也较为分散，与隐私侵权案件数量的总体走势几乎一致。本文编码对个人身份信息严格限定，但其披露也可能带来电话骚扰和生活空间被侵入，进而进入传统隐私的范畴，在此意义上，个人信息与传统隐私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在进入隐私侵权诉讼中也可能获得法院的认可。例如“被告……将原告的手机号码、姓名、家庭住址、出生日期以及其他消费资料提供给了新国信上海分公司……（后者）又将筛选出的上述客户信息有偿提供给了xx人寿……向目标客户销售保险产品，被告通过新国信上海分公司向xx人寿收取费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9）狭义的隐私并不包含单纯的个人信息，因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性人格属性，但获取了该信息的服务部门未经同意以有偿的方式售卖，不仅关涉个人信息的所有权归属，营销和骚扰也打扰了原告的私人生活，最终法院认可了原告的诉求。除同类或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之间共享个人信息以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外，本文编码案例还包含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交付个人信息，并成为后续纠纷中的凭证的情形，如：“被告……因工作关系掌握了原告的一些个人信息。在原告与该公司发生劳动争议期间，被告恶意散发原告的个人信息，信息中含有原告及家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婚姻状况等内容。”（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而后者由于关涉劳动争议的举证，被法院否决了原告的隐私权主张。

互联网公司掌握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及上网痕迹，让日常生活的泄露隐患大大增加，如：“2014年10月，我与鲁超在趣拿公司下辖网站去哪儿网购买了东方航空公司机票。后我收到由尾号为0529号码发来的短信，该短信中列明了我的姓名、航班号等个人隐私信息，并告知我所购航班因机械故障取消。对方泄露了我的个人隐私信息，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a）然而这起案件的法院在确认两被告存在极大的泄露原告个人信息可能性，且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下依然拒绝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庞理鹏因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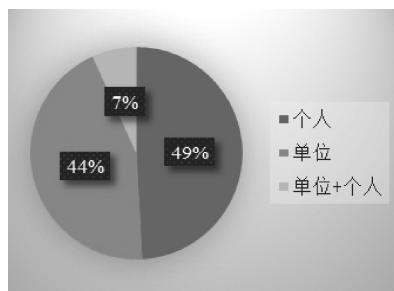


图3 被告身份

隐私信息被泄露而引发明显的精神痛苦，故对该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总的来说，当前法院对个人信息的隐私权属性认定严格，除非个人信息的泄露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或触及了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利益，否则法院尽管确认侵权事实存在，但判决倾向于不让被告承担任何侵权责任。

5.样本案件中，个人被告数量与单位被告数量几乎持平。而单位被告以银行金融机构（32）、政府机构（26）、互联网公司（23）、物业公司（21）和新闻媒体（20）“名列前茅”。在个人被告中，又以亲密关系、邻居关系出现最多，雇佣关系下的纠纷也不在少数。

单位被告中，银行、政府和物业反复出现，其中银行掌握着准确的个人财产及征信信息，当出现泄露或交易，让其成为隐私侵权被告席上的常客；而被告席上的政府以基层组织村委会和居委会居多，与物业公司类似，他们与原告之间产生了密切的生活关联，在基层治理或社区服务过程中因为公示栏、信息披露等与原告产生摩擦，甚至出现在被告席上。

本文更加关注互联网公司作为被告的情形。正如我们的日常感知，互联网公司中的搜索引擎、信息共享平台、电商、贴吧、论坛等都有成为被告的案例。互联网存留了越来越多的个人痕迹，使得原本不属于隐私的信息“隐私化”，如搜索引擎掌握个人的检索记录，并实现广告内容的精准投放创造利润[朱烨诉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Cookie隐私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信息共享网站让原本四散的人群得以网上聚合、共享资源，但激活个人也带来信息的复杂及真伪难辨，聚合平台可能需要承担信息发布主体在知情下的扩大责任[王某某与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重庆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8）]；电商平台掌握个人购物信息，但若管理不善造成信息泄露，可能引发诈骗等后果[李某与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6）]……

隐私存在公开即丧失的特性，而互联网传播将这种特性无限放大，预期中的私下交流或争执一经上网可能引起广泛传播，交通事故的私下矛盾被一方拍摄上网引起广泛围观[梁某某诉谭某隐私权纠纷案（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7）]、学生间的打闹上传网络成为社会事件[原告王某1与被告金某1绍兴市袍江中学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纠纷案（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等。由此，隐私权的义务主义可能从亲密关系、熟人关系拓展到偶然遇上的陌生人，私事的公开化只在人的一念之间。或许人们亟需掌握对交流信息和个人信息的

表1 被告反驳理由

程序性反驳	举证不足	27
	主体不适格	60
	超出诉讼时效	4
	无法律依据	9
	诉讼问题	14
实体性反驳	过错	109
	损害	171
	违法性	136
	行为	264
	因果关系	12
无反驳（未答辩）		20
承认诉求		16

自主控制力，但这种能力在迅速弱化。

6.总体上，只要可能降低甚至免于承担责任的理由，被告都会尝试提及，一个案件被告也通常会提出多个反驳理由。不过编码案例中也出现了近20起案件被告不予答辩及16起承认部分原告所述内容的情形。对于被告编码结果，本文重点分析其实体的行为层面对隐私权的理解。

从行为看，被告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原告所诉并非隐私：其一，摄像头所拍摄到的公共区域并非隐私，在上述邻里关系摄像头安装纠纷中这一反驳频繁出现，如“摄像头的可视距离是20米至30米，所以不妨碍原告的起居生活，也没有侵害其隐私权。”（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在监视相关隐私侵权案件中，被告通常以保护自身权益为由展开辩解，其中部分还关涉第三人甚至原告对其生活环境的入侵，因举证需求而开展“私力救济”，摄像头安装所保护的法益与原告的隐私权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和冲突。“被告在公用部位安装监控摄像头是因为原告的妻子私自拆卸被告的水表阀门，擅自切断被告的水、电、煤，被告也曾报警……被告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a）其二，已经被公开或本就具有公开性的信息不是隐私。“原告在此期节目录制播出和DVD发行后，还进一步参与A电视台《心理访谈》栏目……公布自己暴食暴饮、厌食症、暴食症、心理障碍等问题，表明原告对《xx》节目的认同和积极参与的心理态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1a）被告辩解中的公开也包含推定公开，如“该统计表属于村委会财务公示范围，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上述信息不具备隐私的性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其三，不能指向

明确当事人的没有侵犯隐私：“从原告提交的经公证的发布在网上的判决书可以看出，判决书中只有‘董某某’这个名字，并没有详细的个人信息，不能确定这份判决就是原告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其四，没有涉及私密内容的不是隐私。“隐私权是指受法律保护，不为公众所知秘密……本案中，第三人傅某只是将原告手机有无漫游的情况提交法庭，并不涉及通讯内容，所以没有侵犯其隐私权。”（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2013）

从实体层面对侵权行为进行反驳反映了被告及其律师对隐私权的理解，但信息社会出现了诸多的新变化：其一，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是相对概念，即便公开场合的私下交往距离亦可被推定原告的私人区域范畴，摄像头拍摄范围和内容也需要在具体情景下具体分析；其二，公开和推定公开在多大程度上侵犯隐私权，同样需要在具体语境中讨论，由于交流和交往中必然伴随信息的披露以换取相应的服务和信任，但披露范围、使用方式是否合理，有待法院的平衡和确认；其三，当前，无论个人信息还是传统隐私，其财产权属性都被放大，个人消费画像对商业机构产生巨大吸引力、简单的个人信息因也为定向营销带来巨大价值，这些信息的产权归属和配置也有待需法院确定。

另外，虽然我国已经明确规定隐私权为重要人格侵权案由，但在少数隐私侵权诉讼中，还是出现了被告以我国对于隐私侵权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反驳理由，在样本案件中至少出现了9例类似表述：“我国并无对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规定，只有当隐私权与名誉权竞合，即侵犯隐私权达到侵害名誉的情况下，才受理隐私权案件。”（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隐私权保护作出专门性规定，原告所诉无法律依据。”（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2010）尽管这种反驳往往得不到法院的认可，但依然可见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成文法国家对于法律理解和法律运用的重要意义。

（二）司法的隐私侵权诉讼回应及态度

通过法院判决可透视当前司法实践对隐私权的态度和回应，从样本全部一审案件看，其法院的裁决情况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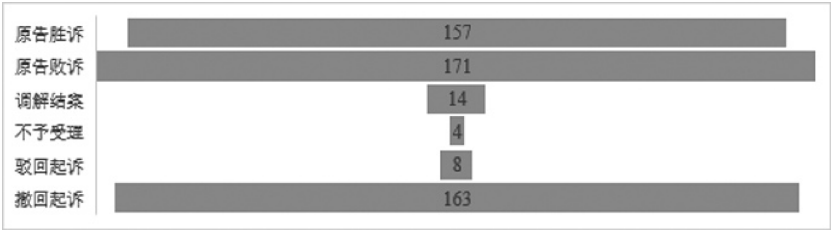


图4 法院审判

1.就未调解、撤诉等情况下，法院所判定的原告胜诉率与败诉率几乎相当，样本案件中的原告胜诉率略低于败诉率。

在本文将法院支持了原告任一诉求请求都编码为原告胜诉的情况下，原告胜诉可能只是支持了其赔礼道歉或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而已。编码显示，全部胜诉案件中仅半数支持了原告的损害赔偿（86例），其余多数支持了赔礼道歉（104例）和停止侵权（53例）的诉求。对应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分别是赔偿损失274例、赔礼道歉241例、停止侵权193例。

其中，隐私侵权被法院支持的赔偿损害绝大多数属于精神损害赔偿（75例），赔偿金额从1元到10万元不等，多数集中在1000—5000元之间。最高赔偿金额案件之一发生在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纠纷中，案件关涉钱钟书、杨绛及其女儿与朋友李某某之间的书信被公开拍卖事宜，法院判定拍卖公司和李某某共同赔偿精神损害10万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另一起同样额度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涉及明星的隐私信息公开，在影星黄奕与前夫黄毅清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隐私侵权纠纷中，黄毅清陆续在微博发布66条辱骂和侮辱性言论、公开披露黄奕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和出入境记录等，引起大量的转载和传播。法院确认两被告共同侵权，其中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履行道歉义务，而黄毅清承担赔偿10万元的侵权责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b）。

编码还显示，撤诉案件中的个人被告与单位被告数量也几乎持平，前者有102例，后者则有85例，另外有13起单位和个人同为被告的情况。而14个调解结案中，3起为单位被告，其余11起均为个人被告。在撤诉理由并未列明，调解结论也并不公布的情况下，对此类案件的具体情形无法展开分析。

2.原告败诉的理由分布分散，总的来说法院从实体层面否决隐私侵权行为占比较高，而其中又以从行为否决侵权为最多（99例）。从实体层面抑制隐私侵权的构成，反映了法院对隐私权司法实践在法律和其他社会利益等因素之间的平衡考量。

表2 原告败诉理由

程序		85
实体	行为	99
	损害	29
	违法性	47
	过错	50
	因果关系	10



如果原告视野中隐私是其不希望被他人知悉的秘密或不能被打扰的私人空间，在法院审理下，这种秘密和私人空间不应该也不可能毫无边界，Richard Posner（1978）早就从法经济学角度予以阐释，即无论商业还是人际交往，掌握信息是降低不确定性的前提，尤其在特定关系中这种需求表现得更加强烈——如夫妻关系、合伙关系、债权人和竞争对手等等，在这些情形中，刻意的隐瞒可能构成欺诈。因此，司法实践中的考虑更加复杂。

在本文的编码中，我国法院至少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限制隐私权的主张：

其一，双方属于利益攸关方的情形下，原告的掩藏行为若将给被告带来利益受损，则被告的试图获知被掩藏信息的行为不应当构成隐私侵权。这种特定的利益攸关关系就包括雇主和雇员在工作场合下的管理、夫妻双方的忠诚、应当被社会知悉的违法犯罪等应当知悉特定信息的情形。如在陈某某诉安某某隐私权纠纷中，原告称被告拍摄其工作期间的照片到单位群侵犯了其隐私，但法院提出“原告未否认将员工工作期间的表现上传至本单位工作群系员工汇报工作的一种方式……被告作为原告工作期间的直接负责人，被告的行为并未超出其工作职责范围，被告的行为也非法律禁止的行为。”（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8）夫妻双方知晓对方的消费情况、忠诚情况，牵涉到对方的重要权益和社会的公序良俗，也被法院否决隐私侵权：

在被告与李菲的通话过程中……将被告之前与原告通话过程中……“酒店开房找小姐犯不犯法”等原告话语转述给李菲……从被告与李菲的通话内容看，主要目的是为了核实原告的信用卡消费并催讨债务。李菲当时系原告的妻子，被告将其作为共同债务人向其核实原告的信用卡债务并催讨，并不属于宣扬他人的隐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

对于原告自身做过的犯罪行为，被被告公开，法院也认为这是一种对公众的提示，不应当属于被保护的隐私权：“董某某因合同诈骗被判处刑罚的信息，不属于依法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故法图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2012）杨刑初字第526号刑事判决书的行为没有侵犯董某某的隐私权。”（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

其二，违法性抑制中的公共利益、新闻自由、法庭举证等行为，均属其他抑制性法益，隐私权与其双方的“较量”中往往让位于上述法益。

如刑事案件追踪中对原告隐私信息的追查情形：

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有关部门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

进行检查，现原告虽称其本人未涉刑事犯罪，但并不因此排除有关机关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而查询相关人员的通讯记录，故即使有关部门通过正常的程序查询了涉案号码通讯记录，也无法就此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

新闻有效信源如实报道信息的情形：

被告已经提交证据证实，其根据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编辑提供的稿件在《江海晚报》、《南通日报》刊登文章……对原告因违反法庭规则、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拘留十日的事实如实载明……不存在新闻报道严重失实、宣扬原告隐私从而导致原告名誉权、隐私权受到损害的情形（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5）。

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正常的监督的情形：“被告对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原告刘某某通过拍摄照片的方式行使监督权并无不当，结合马集镇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发现原告刘某某确实存在工作期间脱岗离岗的事实，被告周某检举控告原告刘某某脱岗离岗有一定事实依据，故……不能认定其构成违法行为。”（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2018）

被告在与原告的其他诉讼纠纷中的举证，无论其本人还是第三人提供证据的情形下均被法院否认隐私侵权：“从传播范围来看，该报告仅在被告第一医院、俞某与第三人葛某某之间传播，并没有向社会上不特定的人群散播，也没有给原告造成损害后果。”（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被告伊利杭州公司获取原告的通话记录后，仅作为证据向仲裁机关提交，并未用于其他目的，也未向不特定的人宣扬，属于正常使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

其三，在已经公开或推定被公开的场合，原告主张的隐私侵权不应当成立。其中包括公共道路或公共区域不是受保护的隐私区域：“原告在小区公共道路的行走系暴露于公众视野中的行为，非属个人隐私范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b）原告主动接受媒体采访透露的信息，认定其主动公开：“A电视台作为全国性的媒体单位……故原告在节目中透露的个人信息，应认定已向社会公布，被告的行为并不属于公布他人隐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1b）小范围正常的公开，或未真正公开被推定未公开：“政法大学举办的研讨会是学术性的论坛，制作的会议手册的发放对象也是特定的专家学者，并非在社会范围内无目的的随意投

放。”（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

其四，当可识别的个人身份信息被泄露，但在未证实遭受其他相关联的损害的情形中，法院倾向于否认隐私侵权的存在。这样的案件反复出现在样本案例中，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频次尤高：“单纯的身份证号码并不直接等同于公民隐私权，被告在报道中未对身份证号码进行遮挡并不当然被认定为暴露隐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法院也否决了可更换的电话号码和邮箱的隐私权属性：“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信息仅是现代人为与他人进行交流的通讯手段，随时可以更换，并非附着于人身人格的一种权利。”（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已被公开的裁判信息自然也不被法院认为属于隐私权范畴：

被告尽管在没有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在该村的公告栏处张贴行政判决书，但该判决书是公开性的法律文书，且判决书中当事人的姓名、年龄、住址等信息及纠纷情况在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过程中均已经暴露于法庭之上……判决书所载的个人信息及双方的纠纷情况尚不具有明显的个人隐私性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

其五，法院甚至判决原告已经发送的信息不属原告所有，不享有隐私权：“原告称被告公开了双方的短信内容系侵犯了其隐私权，但由于原告给被告的短信经发送后即不属于其个人，且原告工作处所、与章彦明的婚姻关系也非不能公开的信息。”（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然而这类争议成为信息社会隐私权的重要隐喻——私下交流信息的传播扩散，私下信息的公开化，其如何配置所有权可能存在巨大争议。

3.从程序层面看，原告因程序性因素败诉主要由于举证不足（74例），主体不适格（6例）、诉讼问题（3例）、超出诉讼时效（2例）也零星出现。程序层面的败诉理由也反映了原告在信息社会通过诉讼程序主张隐私权的某些困境。

原告隐私侵权举证不能的第一困境是难以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其中私生活空间被闯入无法记录，技术壁垒造成隐私获取行为甚至难以被知晓或证明，法院自然无法支持其诉求：“原告主张被告擅自闯入其家中，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6）在汉庭酒店开房信息泄露案中，法院提出“本院难以确认互联网上流传的‘2000万开房信息’中的原告信息就是被告酒店管理系统和个人会员管理系统中留存的原告信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当前诸多隐私焦虑的相关文献已经说明，人们在信息大潮中对信息披露与否心存疑虑，一

方面是接受服务所必须的信息披露,另一方面是自己对这种披露后的信息丧失了控制权,如此形成接受服务过程中是否被泄露和侵害心存疑虑。但在隐私权司法实践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下,作为普通人的原告几乎无法证明个人信息泄露是否发生,法院自然也难以认可其主张。

与之直接相关的另一困境在于原告无法证明侵权行为人为被告:

仅凭原告提供的“东湖豪庭管理...便民服务群”中出现以“管理处-杨晓磊”的名义发布的涉案判决书照片,尚不足以认定系由被告或者被告的工作人员将涉案判决书发布至微信群……并且原告仅提供了该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打印件,未能提供原件以供法庭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

这种情形在互联网公司的隐私侵权案件中表现尤其突出,在前台匿名的情况下,未得到互联网平台的帮助,几乎难以证明信息发布主体的真实身份:“尽管陈洪兵、王小清提供了上述网络帖子的打印件,但有关证明该帖子系吴文金、肖秀金所写并发布在公众微信号上的证据不足……但该微信号未经实名认证,且帖子上的联系电话亦不能证明确认系吴文金、肖秀金使用。”(平潭县人民法院,2017)

“经法庭审理,并不能断定盗用原告ID号发帖的行为系被告所为,也不足以证明被告泄露原告隐私以及不予制止公司其他会员在即墨论坛发帖辱骂原告……故在现有证据情况下,不宜认定被告青岛林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构成侵犯原告郑海燕的名誉权。”(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7)

举证不足而败诉的情形频频发生,举证成为信息社会隐私侵权通过民事途径保障的最大困境,作为个人主体,普通人越来越难以知晓自己的信息包含哪些内容、被谁获得,也无法确知自己的隐私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获得,流向了何方,甚至在确知隐私信息被泄露的情况下,也无法查实侵权者是谁,不知该向谁主张隐私侵权赔偿。

#### 四、小结与讨论

通过上述对样本裁判文书的数据呈现和文本挖掘,本文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呈现信息社会人们的隐私权利主张及司法实践的回应:

##### (一) 利益交织的原被告双方隐私权需要再平衡

原被告作为纠纷对立双方,一方尽可能主张自己拥有隐私权,另一方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行为展开辩解。被告从身份看,其与原告通常具有较为密切的关

联, 尽管单位和个人被告数量相当, 单位被告以银行、医院、物业或基层政府以及互联网公司为主, 属于为原告提供服务的部门, 而个人被告则往往是邻居、夫妻情侣等熟人情形, 陌生人也因信息发布而偶尔坐上被告席, 但并不是主流。这也是隐私权的内在特性——通常情况下, 只有关系紧密的交往对象才能掌握原告的隐私。

然而在密切的关联中, 原被告双方表现出各自权利主张上的张力。原告对隐私权范围的理解已经比较宽泛: 私事的公开中, 个人裸照的散播和肖像的商用作为传统隐私的代表依然时不时进入诉讼, 但不是主流, 相应的银行征信信息、个人财务状况、医疗就诊信息、酒店开房信息等特殊信息的公开案件数量较多, 这也让服务提供方的银行、医院和酒店屡屡坐上被告席; 私生活的侵入在今天中国语境下也备受关注, 尤其监视设施价格低廉且限定较小的情况下, 一方面可以低成本满足人们窥探的愿望, 另一方面出于对自己安全和利益的考量等, 也让监视偷拍受到关切, 而骚扰电话和垃圾邮件也在全民皆为推广员的时代不断侵入人们的邮箱和电话, 打扰人们的生活安宁; 侵害信息隐私被贴上了浓厚的信息社会的标签, 在交往和交流中, 个人信息成为获得服务和信任的前提, 可一旦被交付, 产权归属就走入模糊的地带, 对方如何使用, 在多大程度上使用, 以及随后个人信息被冒用、个人定位被掌握、个人痕迹被追踪都成为已经发生的现实案例, 普通人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但被告也有足够的理由开展反驳。特定利益关系下, 征信信息在银行间的共享, 目的在降低信贷风险; 医院将诊疗信息写在病历本上或将入职体检报告提供给用人单位, 作为正常的职务行为, 在没有故意泄露病例信息的情况, 都不应当被过分苛责; 用人单位内部巡查是一种企业规范管理体系; 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 原告尝试掩藏掩饰, 被告却试图知悉真相, 邻居关系之间不一定只存在和睦相处, 边界划定及纠纷也时而出现, 亲密关系往往伴随着忠诚义务……这种具体个案中的在平衡, 有待法院解决。

## (二) 法院对隐私权主张持有限保护的保守态度

正因为如此, 在原被告角逐张力中, 法院否决了半数以上原告的诉求, 加上数量庞大的撤诉和调解情形, 原告胜诉的比例显得更加微小。

从实体层面看, 原告隐私侵权的诉讼事由, 在行为、损害、违法性及因果关系上都可能受到抑制, 本文在此概括法院两个层面的考量: 1. 从行为层面, 隐私的范围和保护程度需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考虑, 受到具体的情景的限制。一种是利益攸关方交往的情景, 当掩藏和秘密将带来对方利益受损, 被告知情的努力在法定范围内不构成侵权。尤其在雇主和雇员、夫妻双方、债权债务双方等情形下, 彼此知悉利益攸关的信息应当被司法支持。另一种则是已公开或推定原告所称的隐私已经



被公开的场合，原告主张的隐私侵权不应当成立。这种公开或推定公开的场合包括公开的裁判文书、主动的信息披露如接受媒体采访和已经发送出去的信息。2.从违法性层面，抑制隐私权的其它法律因素不仅包括了法益冲突下的公共利益、新闻自由、司法举证等行为，还包括了保护互联网服务商的避风港规则，以及原告同意和原告过错亦属于对被告违法性追责的抑制性因素。

信息社会，隐私侵权诉讼中严格的实体认定，可能在司法实践中给原告带来侵权举证上的困境。首先摆在原告面前的就是举证隐私侵权事实是否存在以及侵权对象究竟是谁的困境。本文编码所示，在司法实践中这种举证不能将直接导致败诉后果，在面对单位被告和互联网的前台匿名特性，这一困难尤为突出。其二，在隐私侵权诉讼中，法院还要求原告证明其损害后果。个人可识别的信息在原告视域下是需要保护的隐私，但在法院看来，这些信息若只是短时间内在小范围公布，并未造成损害后果，法院明确不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公共区域、正式文件、骚扰邮件等亦是如此，原告难以证实其对私人空间的打扰及其隐私侵权性。另外，对于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原告关注到了邻居家那个明显的探头，但更大范围内的监视不仅无法发现，也无法主张权利，若以其他权利的保护为由无止尽扩大监视可以开展的范围，则可能导致研究者所担心的“监控社会”<sup>2</sup>带来的个人隐私消亡，探究和限定其边界或许需要更深入的讨论（王俊秀，2006：231）。

随着我国互联网应用得到快速发展，原告对隐私权如欲通过民事司法途径开展救济，却恐怕存在技术壁垒和证据搜集上的巨大困难。总体上，当前我国隐私侵权案件回应的依然更多是传统隐私及信息泄露的实质性损害案件，呈现出保守的弱保护态势。

### （三）信息社会的隐私困境无法通过民事司法途径完全保障

隐私侵权举证困境可能更加凸显了当前信息社会的隐私现状：1. 人们害怕被监视，但监视的可能性和途径花样翻新，除了邻居家的摄像头或猫眼，公共场所的闭路影像、随身携带的手机摄像头，以及看不见的后台抓取、存储、分析和自动上传云端，实时更新的位置信息还掌握了人们的日常轨迹，成为阻碍“独处权”实现的巨大障碍，肉眼可见的邻家那个显眼的摄像头，在很多时候或许只是摆设；2. 名义上每个人是自己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权利主体，但个人信息搜集的样式和内容已经超越了其掌控甚至知晓的范畴，而千禧一代更是从出生起一切互联网使用痕迹都已经被刻录，这些早已不可能是个人自主决定和自我控制的范畴，无论其被抓取、被分析还是被利用，不用说使用权，知晓权都在丧失边缘；3. 信息的自动生成和人人信息传播大氛围中，垃圾邮件、广告促销对信息接收端狂轰滥炸，但骚扰源和侵权主

体都是普通人举证能力无法企及之处……

换言之，一方面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独立空间，可以以不同的身份穿梭于论坛、社交媒体、电商平台，而不一定以真实身份示人；另一方面人们的这种掩藏在多数时间里却是徒劳的——任何行为行踪都伴随着痕迹，大数据的奥义就在于对这些痕迹的解析和还原，你以为自己掩藏了，但最终可能都无法逃脱这些痕迹“矢志不忘”，私生活被还原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破解的权利，并不仅仅掌握在平台手中。

正如本文编码所示，司法实践需要平衡隐私权与其他诸多权益之间的关系，隐私权绝不是一项强势的权利，从实体上，法院裁决需要充分考虑隐私权与其它社会利益之间的配置问题，也需要从程序层面要求原告充分举证。被告可能积极运用包含监视手段在内的信息技术保护自己的其它权利，债权债务关系下的信息披露，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下对自我领地的保护或法院的举证等等成为被告以入侵原告隐私的形式主张自己权利的手段。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正是当前信息社会的核心隐喻，除了隐私权外，还有其他还有包含财产权在内的诸多重要权利。Posner（1978）称，隐私权是一种遮蔽和隐藏的权利，有保护的必要，但人们对他人隐私信息的掌握包含了交往关系、经济关系、亲密关系等多种复杂的关联，政府文书与社区利益等复杂的因素也裹挟其中，原告尽管可以提出隐私侵权主张，但其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支持，尚需具体语境下的法院裁决。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无论是Brandies和Warren还是Westin等人都在不断强调隐私权的“有限披露”和“有限接触”，立法和研究者也试图让个人拥有隐私自主控制的权利和能力，GDPR的颁行也试图给个人更大的个人信息决策权。可今天在讨论这种决策权或个人信息产权的时候，会发现这与透明社会文化内核、数据公司的商业利益、甚至国家的信息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法院的再平衡，可能最终只会选择让“渺小的”隐私权，其“有限接触”或“有限披露”成为神话——本文编码已经显示，个人通过民事手段想要在巨大的技术鸿沟下实现自我保护却困难重重，作为权利主体的普通人，仅能针对显眼的、身边人所做的看得见的伤害，主张一点皮毛上的隐私权。信息社会对隐私权影响更深远的方面，至少在样本案件中没有得到司法的回应。这与人们的权利能力相关，也与技术壁垒相关，更与当前的司法保护基本逻辑相关，隐私权保护，单一依靠民法或侵权责任法成为神话。而平台和行政主管部门等掌握了强大技术鉴别和影响力的机构的积极介入和通力合作，或许才能真正实现隐私权的保护，真正让普通人享有隐私权。

（责任编辑：黄琦翔）

### 注释 [Notes]

1. 因检索截至日期为2019年7月31日，2019年的数据搜集不充分。
2. 如1994年David Lyon通过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一书，2001年，David Lyon再次通过open university press出版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讨论了监控社会对日常生活的入侵。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26222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6417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0634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初字第02124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4481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初字第10113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20249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18675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3682号民事判决书。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28219号民事判决书。
-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3民初1952号民事判决书。
- 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2016）。闽0824民初1493号民事判决书。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308号民事判决书。
-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7）。粤0902民初317号民事裁定书。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2312号民事判决书。
-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杭拱民初字第281号民事判决书。
- 黑龙江省富裕县人民法院（2018）。黑0227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书。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4778号民事判决书。
-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4030号民事判决书。
-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14）。浔民一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书。
-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8）。吉0202民初562号民事裁定书。
-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2民初1123号民事判决书。
-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2010）。皋开民初字第0829号民事判决书。
-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5）。泰靖民初字第1770号民事判决书。
- 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2018）。苏1081民初517号民事判决书。
-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沈民（1）权终字2026号民事判决书。
- 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2013）。新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判决书。

-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民初字第2088号民事判决书。
-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民初字第3031号民事判决书。
- 平潭县人民法院（2017）。闽0128民初3094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0）。徐民初字第1430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2000）。卢民初字第2525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501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徐民一（民）初字第3430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1）。闵民一（民）初字第1076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9）。浦民一（民）初字第9737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1537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徐民一（民）初字第3055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1）。闵民一（民）初字第1073号民事判决书。
-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1676号民事判决书。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11664号民事判决书。
-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7）。鲁0282民初5938号民事判决书。
-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4民初15232号民事判决书。
-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4民初799号民事判决书。
- 王俊秀（2006）。《监控社会与个人隐私：关于监控边界的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王利明（2017）。《民法总则》的本土性与时代性。《交大法学》，（3），87-94。
- 喻国明（2015）。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兼论“平台型媒体”是未来媒介发展的主流模式。《新闻与写作》，（2），41-44。
- 张明安（2012）。《公开他人私人事务的隐私侵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5）。甬余民初字第3632号民事判决书。
-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民初4752号民事判决书。
- Fried, C. (1968). Privacy. *Yale L.J.*, 77(3), 475-493.
- Powers, M. (1996). A cognitive access definition of privacy. *Law and Philosophy*, 15(4), 369-386.
- Posner, A. R. (1978). The right of privacy. *Georgia Law Review*, 12(2), 361-392.
- Posner, A. R. (1981). The Economics of Priva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2), 405-409.
- Warren, D.S. & Brandeis, D.L. (1890). 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4(5), 193-220.
- Westin, F.A. (1968). Privacy and Freedom.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25(1), 165-170.